



分层社会里,文学批评肯定也是被等级化的,这个似乎不用太多论据来证明,大家应该心知肚明。经济社会所培养的发展主义,肇始于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成型,这是长话。往简单里说,发展主义其实是和强势话语贴得很紧的一种世界观、人生态观。不见得每一根毛细血管都紧张,但曲里拐弯中,每一根毛细血管一定都仿佛是充血的。应该说,这种力量早已成为主流文学及其批评发展的驱动力了,只不过,起初总还是有藏有掖。等到暴露得比较彻底之时,他们一定率先嗅到了支持层化语境合理化氛围的到来。因为对于社会,观察其层化现实,首先得从资源的占有者入手,底层反而不是风向标。在阶层版图上,看起来充满道德优越感的底层,正因事实上可以忽略,人们才愿意给他们一些看似慷慨的话语。如果反过来,理论上就没有必要再无休止纠缠。这一现象看似荒谬,实质却坚硬存在于人们的经验中。

文学批评的分层与『发展主义』问题

牛学智

文学批评的发展主义导致的层化现象,并没有社会分层和发展主义那么直接,这首先是因为决策者不可能都是文学天才,有源源不断的产品被生产出来供人们学习、拜读,其发展主义只能通过他人来彰显。这个过程同样曲径通幽,既极尽之文雅,又极尽之粗暴;既极尽之情怀,又极尽之冷漠。总之,明明是等级化的遴选,却又偏偏从底层的角度来论证和完成,一切符合文学该有的委婉与动听。

那么,一个被批评权力层挤压到边缘的打酱油者能否对这一高雅行当发表点看法呢?我想,应该能。就像看一台戏,台上的热火朝天抑或蹇脚凑合,总得有台下观众的喝彩或者倒掌,效果才能得以直接折射。否则,要么是白痴,要么是真的脸皮厚,二者必居其一。现在想想,笔者曾以《有“耻感”是文学批评的底线》(《文学自由谈》2022年第1期)为题所提建议,应该有所修正才适应新的形势。因为有无耻感,仅仅是私德问题,基本波及不到公共话语的文学批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期刊作品理当是文学生产线上的流水线产品。不管这样的产品日产多少、月产多少、年产多少,在文学批评眼里,它们都是当下文学史的当然内容,应该以文学批评所知经典态度面对。那么,用什么大词,启动什么大概念,乃至说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于文学批评来说,的确与私德无关。不但无关,仅从认知而言,可能还是佐证文学批评繁荣发展的有力实例。这既是中国式认知论、进步论逻辑,同时更是中国式私德与公德合二为一的传统使然。所谓“同情之理解”“知人论世”,就是这个道理。最起码,可以有效避免“厚古薄今”“崇洋媚外”“厚此薄彼”。毕竟,干干净净、纯粹果断,不带有任何对比参照的成绩,在他们看来才更有资格代表进步的无可置辩。

我所知文学批评,究其实质,应该践行的就是这一条铁律。即是说,只有把“耻感”的问题,转换为要达到预期目标可以不考虑私德才能成立,这里面自然包含不计个人得失而为了什么的献身精神,抑或不管社会思潮作何涌动,只要是“坚守”自己认定——多数则实为只能如此勉为其难坚持的“文学观”,也必然在表彰范围。“精神”和“坚守”就成了中国文学批评,至少是当前文学批评能明确感知到的一个坚硬存在。围绕这两点而展开的实证分析,也才能得到广泛认可,自然也是标志文学批评实绩的两个核心。当然,这两个核心最终还是在为一个理念而奔忙而服务。中国文学批评一直不忘讲“精神”,譬如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现代主义精神,批判精神等。说到底,诸多精神背后的统摄性精神,其其实就是“发展”的精神,准确说是,证明如何发展了的精神。这“如何”不是方法论,按照中国文学批评的惯性,是主体性。绕一大圈,离不开谈人,这即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精华所在。在这个意义,就好理解文学批评中集体暴露的一些普遍性现象了。财政出资办文学期刊,单位聘请资深专家论证、审定一批精神产品,各级奖项奖掖精品力作,目的就是国家代言人的姿态代言什么是文学的发展这个朴素道理。批评家的产品就内在于这个出版传媒流程之中,只要被授权能被读者看到,就不可能外在于这个发展的体系之外。

有了这样一个基本背景,讨论文学批评,如果还纠缠于所评作品太“新”,以至于为未曾经历起码的阅读检验而懊恼,或者还纠结于所阐释对象是哥儿们弟兄饭后茶余忧国忧民的附属品而倍感轻佻,肯定是一种思维错位。这两项东西,除了是文学批评的当然工作对象之外,更重要的在于这两项东

西本身所代表的符号象征意义。经常阅读文学批评文本的读者大概都有一个差不多的印象,所谓“新”,在它标志新出产这个本意外,真正的象征性内涵其实是,它是批评家阐释其“新”理解、“新”意蕴的绝佳载体。作家写作过程中是否真植入了“新”元素,或者“新”元素究竟占比较多还是旧素材较多,倒在其次。至于哥儿们弟兄之间的拍拍打打,评者与被评者之间的亲密关系,索性说是对文学资源的一种巧妙分享,鬼才相信一部铅墨尚未干尽的作品是“经典”呢!除非作家中真有什么百年不遇的天才。在这一块,与其说恩格斯意义的文学理论典型论在文学批评中褪去了昔日光环,不如说其典型论精髓早已转换成了“经典”作家诞生论或突出论了。悉心观察近年来的文坛,这一点秘密就不难被发现。如果某个作家被预定为下一届什么大奖的候选人,在备选档期,某人作品一定会经历一个遍地开花的发表“井喷”过程,然后是频频举办高档次高规格高人参与的研讨会,紧随其后的不用多说,便是一帮批评跟班的批评文章应运而生。我不愿把这个现象叫“造势”的原因是,“造势”还多少带有那么一点朝中无人的盲目性,而此种打造则从一开始就带着明确而果决的量身定制属性。其突出表现是恰如其分利用文学批评的话语构造和价值模式行事,能让文学批评自能其事地去说话。就是说,在作家诞生论或突出论的生产流程中,这个时代几乎所有文学应当首先关注的话题和概念,都会被自然而然组织进批评结构的逻辑链条中去,进而使其成为一批作品中的“珠穆朗玛峰”。在《流动的时代》一书中,鲍曼把知识技术主义带节奏的现象,称之为专家主宰的世界。几年前,我曾借用这一视野分析过文学批评的分层现象,但那时并未自觉意识到专家主宰,有一天会真的成为改变文学批评本质属性的地步。现在看来,它不但成功改变了批评方向,而且还进一步篡改了批评本身。

至于文学“专家”,是不是像近日来网上网下揶揄的“砖家”那样,凭凭政治立场和商业利益发表对专业的看法,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也不愿如此往更差处想问题。当然,退一步说,即使因着文学本身便是修辞术的集大成者,如此“遴选”很可能隐藏了更多垃圾,最坏的后果,那也不至于贻误生命乃至导致财产蒙受多么致命损失。文学建构的是一种可能性生活,大不了可能性没有多少可能而已。一旦“经典化”意识形态形成,被动的读者恐怕很难从思维定势中撤出,到那时,人们所认同的经典就不再是深入介入现实结构和文化程式的思想叙事,而是本雅明所谓机械复制时代的赝品。如果按照鲍曼《流动的时代》里的另一观点,专家主宰的世界更容易变成庸人世界来说,文学“专家”所裁决的文学经典,势必更难摆脱庸人标准。因为所谓庸人世界,在鲍曼的意义上,究其实质指的是政治动物的世界。那么,除了政治正确,剩下的能对标对表经典的似乎只剩下真正的经典曾有的情节、细节和人物形象了。倘若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是个真命题,显然,某某某第二肯定是伪命题,像某某某充其量是准伪命题,按照某某某或像某某某的品相组装的若干条款,应该接近笑话了。这还只就对比作品具有足够时间差、时代差来说,更遑论时人给时人作品下结论了。

仅此一端,文学批评所显示出的“智慧”和“机智”,就值得我辈好好望洋兴叹一番,打死你也不会相信如此聪明的文学批评,发现不了这个时代真正需要怎样的批评形式?不明白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文学样态?当然,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棒子打死,例外不是没有。只是此例外抑或看走眼之处是,久而久之,难免入戏太深。固化在“发展

主义”获奖候补作家阶层,忽忽悠悠,一叶障目,也就不再怎么在乎网民或真读者的民意罢了。即使如此,如此运作的逻辑并无什么破绽,因为读者只读经典都未必有足够时间,这是他们相当笃定,并且相当有把握如此做的强悍逻辑支撑。那么,冲着“经典”品相而去的一系列一条龙服务还能有多大问题呢?反证阅读早已成了一项被动的文化事业,塞给什么并不重要,也没人真正上心。真正重要和真正上心的,是谁塞的,以什么方式塞的,全仰赖以权威的名义传输的得体的二字。

唯名论打的正是这一张牌,背后的消费逻辑正在于,他们掌握了自媒体时代文学阅读乃至一切纸质阅读的软肋。知道没有多少人撒下手头要紧的活儿,去阅读什么“无用之学”。或者,即使文学圈内的常客及想挤进该圈的傻瓜,也不都是为着表达精神困惑和价值输出,很有可能多半怀揣不可告人的秘密,像玩抖音、小视频、公众号一样,通过文学形式刷刷存在感而已。这样的语境,对于文学,实在更适合别人喂着吃,而不是主动挑选好吃的。如此一来,专家主宰的文学,便成了人们实际阅读的文学,“正确的”“发展主义”方向之外的文学,事实上仅是该主义文学的附刊。其结局有两种,一种是慢慢进化到符合“发展”的风格并等待征用;另一种是出无数书,发无尽作品,持续表达着绿叶对红花的深情眷顾。

这里,我不妨多延展几句。首先申明,我并未做过大数据分析,并不能准确统计和定位当前这类文学批评的关键词。然而凭借大致目测,便发现“经典化”的论断后面,蛰伏着的一系列指涉,并非论评对象与现实社会的深入互动,也并非论评对象与当前时代的积极沟通。一言以蔽之,折腾半天,其哲学之邈远,其用词之宏富,其形容之繁复,其描述之错综,其判断之暧昧,实际是对“大”的取消,基本指向某种抽象的却又好像是具体的人的内心。我不知道把文学收缩到“心学”,是不是集体领受了王阳明的教诲或暗示,但如果有兴趣,对照《传习录》,套用郭德纲相声段子,从两个此类批评家中,揪出来一个判他为“心学大师”,肯定不算冤枉。

话说到这份儿上,会意的读者估计不难推知,其实这类文学批评家无论仰观天空还是旷野,无论体察草木还是虫鱼,其天才般隐喻之远的文学实质,并非心灵的广阔和精神的辽远,是“小”且虚“小”,虚“实”且空“有”的空洞的能指。说是浪漫主义,却不知为何而浪漫;说是现实主义,却不知所指现实在哪个坐标;说是现代主义,更不知是什么价值羁绊人以及人何以遭此困窘。说是现代性,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知人内心有“柔软”和“美好”的寄存,但不知这柔软和美好是被谁强行毁弃和破坏的;说是后现代性,可一系列“后学”特征又不明显,即是说现代性理性都无以建立,颠覆理性霸权不是更荒谬吗?唯一确知的是貌似“打通”古今中外的“人心”,不管长袍马褂,还是西装革履,最终回归的总还是双脚着地的人,以及人的内心修炼。

这使得当前文学批评,看起来异常繁复以致于知识无限增长,然定睛仔细解剖,则实多为书评的原因之所在。因为他们信赖的“发展主义”,要获得绝对发展,必然需要有个恰当的边界保障。文本细读,或者慧能的“原本无一物”,德里达的“文本之外空无一物”,所起关键性作用,就是避免比较和参照对发展逻辑或体系的致命瓦解。

行文至此,从内心而言,我想由衷地说声洗洗睡吧,但文学批评的发展主义,和别的行业的发展主义并无本质不同,犹如车上了高速,发展是硬道理,岂是说停就能停下来的,更何况方向盘掌握在他们手里。

面向当下诗歌趣味主义误区的《心灵的织锦》

牛学智

《心灵的织锦》是曹有云第4部诗集,该诗集入选2022年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曹有云诗集第二次入选全国性丛书。第一次是2009年卷“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入选者为《时间之花》。两部诗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可见规格之高,也足见业内的首肯程度。在无以计数的一线诗人当中,曹有云能有此特殊待遇,充分说明,偏居青海的曹有云,在诗坛并不偏僻,他能被诗坛中心的评委认可,的确不是浪得虚名。

《心灵的织锦》共收诗作180首之多,由4辑构成,分别是“高原物语”“星空之下”“心灵的织锦”和“金色的风”。看创作时间,由第一首标明的2017年11月18日,到最后一首的2022年7月19日,跨度正好5年。看得出,5年之内,曹有云是持续不断地创作着的。这样一个激情运思,这样一个夜以继日的劳作状态,经验表明,诗风的连续性肯定是很强的。即是说,诗人的第一要务是急切表达和疯狂记录,至于表达得如何,记录得是否饱满,我想,恐怕不是诗人首先摆在第一创作时间前面的问题。这对于曹有云来说,既符合他的性格,又十分吻合他目前为止思考的位置。

每一个值得人信赖的诗人,究其根本,几乎全部诗作,一直在寻找自己得力的思考位置和表达力道。找得准、下手狠,其诗作必然通透而淋漓,主题与思考方向,则无需大动土木不断变化;倘若一开始就是一个诗歌的投机分子,写再多的诗,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是一个趣味的追随者、季风的抄袭者。研究曹有云诗作的准和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诗学问题。这一问题不管别人怎么看,于我而言,的确需要专门论述。我也不揣浅薄,几年前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拙文题目叫《在经济主义价值观中体味曹有云诗歌》(《星星·诗歌理论》,2014年第12期),诚如题目所示,意思是曹有云诗歌价值追求,是反经济个人主义的。这在我们不自觉沉陷其中的伪个性主义、伪自由主义氛围看,好像是违拗语境的。然而,正是这个持续的撬动和使劲,才使他的诗作,显得不同寻常了。

现在,距离我当年写下这篇拙文已然近10年了,曹有云的那股犷劲、猛劲和不守诗歌行规的野性,变了吗?我的基本判断是,没有变。非但没变,反而还在变本加厉。大体上看,《心灵的织锦》就是在如此氛围中写就的,这个氛围恰好正是诗人真切感知到的当前诗歌话语意识形态。这样一个设定,是很有必要的。一是便于聚焦问题所在,二是便于从根本上击穿该问题。

打乱通读这部诗集,直感告诉我,从这部诗集主题而言,曹有云并没有改变对经济个人主义流行价值观的质疑和批判,但他的态度和想法确有所调整。质疑和批判经济个人主义价值观,首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以超量的诗作篇幅来论证经济个人主义流行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对现代价值观的篡改和瓦解。其次才是通过自己的诗歌实践,来建构文化现代性视野的诗歌形式和话语方式。在漫长的焦虑写作中,曹有云大概感觉到了长期一个人的战争的无望,长久孤独复孤独的煎熬的不堪重负,他开始慢慢收缩自己的背景,并开始削减自己设定的观察对象的体量,最后直到减至自己的心灵能承受的范围和分量为止。这样的半径收缩和重量减负,乍一看,好像是诗风转向,其实不然。也不妨说,写作《心灵的织锦》5年间的曹有云,他的审视对象,已经被调整到了诗歌本应关注的范围,大的方面说是他每天都在感知的诗坛,小的方面说,是怎样直面向现实来写诗的问题。他与他设定的这些问题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当然的通途,虽然在他看来,作为诗人,迎着这些问题而去,是起码的尊严和本分。事实却相当地蹉跎,总是让他一次次感受到了错位、别扭、失望和迷茫。用几个也许并不十分准确的关键词来总结,就是渺小、虚构,期待,力量。

从这一组词语造成的语境理解,或许该这么去猜测。通过诗语搏斗,先认识到了自己的柔弱、渺小。然而,诗人的心灵诉求一再提醒,不能气馁,更不该放弃。那么,自己本来应该看到什么、说出什么呢,于是,就有了虚构。虚构于诗,正是诗所要关注的可能之物,不巧的是,曹有云深切意识到,这些可能之物,正在变成虚妄。他的虚构反而成了真正的现实,是只有他才能感知到的实存现实。因此,在读者角度,他的诗仿佛是某种期待。如此往复,他的诗所具有的力量感,正如同另一些诗骨感、力感的丧失。也许我们的所谓主流诗歌对象,一直会认为悉心体察一只猫生命的自然衰败过程,就是诗歌对人生一生的隐喻性哲学观照;也许我们所谓的主流诗歌技巧,始终对一只飞鸟的过境姿势心存留恋和暧昧,也信奉鸟振羽起飞的样子里蕴藏着现代诗歌大量的修辞矿藏;也许我们所谓的主流诗歌思想,坚持认定不断建构孔子的咏而归,乃至于把饭后消食的慢跑,也揉搓得像一场人生耐力的大戏,才配称诗歌的缜里藏针。可是在曹有云这里,高原及高原上的强烈紫外线告诉诗他,这不是诗歌应有的皮肤;野牦牛群踉跄而来呛鼻的尘土告诉他,这亦不是诗歌应有的眼光;藏羚羊剧烈的折角和天地之间空旷的沉默告诉他,这更不是诗歌应有的冥想和力量。

曹有云反复强调“听”日持久”,反复淬炼“相拥而泣”“妄自嗟叹”,这不是对一个确指的人在倾诉。他的背后是一群同路者,一众期待理解者,他相信他看到、听到、体会到的,完全来自诗坛的遮蔽之外,那是一个与高原一样辽阔广袤的诗歌读者群。他们或许不会玩分行文字游戏,不擅长在隐喻中躲猫猫,不习惯在措辞中给心灵蒙上厚麻布。但他们心中自有自己的诗和远方,它们在一枚金针刺穿黑白的瞬间(《金针》),在忙碌的喧嚣之后(《忙碌的喧嚣》),在风雨过后,万物静默之时(《围坐秋天》)。当然,真正认领和理解它们的人,肯定不在某个安逸慵懒的咖啡屋,更不在香烟缭绕眉来眼去的某个会场,他们在石头们聚集的地方(《在高原》),在春雪一样暗自涌动、星空一样遥深无尽的食盐族里(《盐》)。他们当然不是一群廉价的码头搬运工,只坐享其成,别人塞过来就乐不自胜的趣味主义者。他们仍在等待,希望来得“自然天成,突然出现”(《等候》);他们向往宁静的喜悦,但必须放下冰冷的凶器,能在春天暴烈的风中,“稳稳站立”(《春天里》)。

归根结底,这一切的一切,被诗歌有意无意埋没的有形的、无形的,有声的、无声的,都还将仰赖真正的诗歌的一声嘶吼。不是久锁笼中老虎“形散神散,荒腔走板的怪叫”,“必须是那种来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地地道道,原汁原味跟百万年前它们古老生猛的祖先们一样野蛮血腥的一声嘶吼”(《一声嘶吼》)。

一定意义上,《心灵的织锦》就是对诗坛的一声嘶吼。这是这部诗集高频率出现高原,乃至高频率出现渺小、沉默、期待、虚构、力量的根本原因。它们不是简单的构词,是由特定组合形成的声音。这声音来自大地,来自天空,更来自诗坛内部,来自诗歌的语言结构。因此,最终,这些诗指向了诗歌本身。



牛学智 1973年出生于宁夏西吉县,现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银川市作协副主席,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出版《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10部理论著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5项;入选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培养工程,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聘专家,宁夏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宁夏文联“德艺双馨”等人才培养工程或荣誉;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